



Working Paper No. 201806

July 13, 2018 ,

马涛: matao@cass.org.cn

盛斌

## 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sup>①</sup>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亚太经济不断纵深发展，亚太互联经济已成为全球性议题。文章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经成为亚太价值链和国际秩序重构的“朱格诺”，一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正开启新一轮的工业化，并引致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演变。与此同时，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已经通过国际秩序重构影响了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博弈、区域一体化碎片化的整合也加剧了亚太区域经济构架变动；美国亚太战略转变和“新重商主义”给亚太互联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并形成了阻力。文章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模拟了中美贸易冲突的

<sup>①</sup>马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本文已发表于《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



严重后果，为亚太互联经济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逆全球化 亚太互联经济 国际秩序重构 全球价值链

经济全球化，或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当时，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措施，全球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重获发展，并不断深化至今。纵观全球，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正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地区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互联经济体（Interconnected Economies）这一概念由此产生。<sup>②</sup>互联经济体之间产生的经济联系，我们称之为互联经济。2014年，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通过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的北京纲领。<sup>③</sup>2016年，中国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提出构建创新、活力、互联和包容的世界经济。2017年，德国汉堡G20峰会的主题也是塑造互联的世界。由此可见，互联经济已成为世人瞩目的全球性议题。

互联经济是经济全球化更为专业的一种表述。一般来说，互联经

<sup>②</sup>“互联经济体”的概念最早出自2013年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参见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OECD, May 28, 2013。

<sup>③</sup>2014年11月，北京APEC领导人峰会围绕“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通过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三个重点议题。网址：

[http://www.china.com.cn/news/node\\_7214181.htm](http://www.china.com.cn/news/node_7214181.htm)。



济指通过消除贸易壁垒或者联结金融潜能而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进而通往深度经济一体化；参与互联经济的经济体不仅通过贸易，还通过投资或者生产外包的方式，进行大量的商品合作生产与交易；互联经济借助全球或者区域价值链，通过专业化分工，把参与其中的经济体联结起来，彼此相互合作与影响。这也是本文选择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亚太互联经济的初衷。

### 一、亚太互联经济的理论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在贸易方面，从产业内分工发展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使生产专业化更加细化。随着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区域贸易协定中投资条款的不断增多，投资国和引资国的各种动机促使跨国公司业务遍及亚太国家/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日新月异，这些都影响着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全球化是亚太国家/地区经济繁荣的强劲推动力。为了保证全球化始终保持正向的推动力，各国不仅要推行有序的国内改革，还要积极参与基于国际规则的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学者对亚太经济发展格局和战略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分析。<sup>④</sup>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论》阐述了 19 世纪早期形成全球化时代的三个重要变化：一是

<sup>④</sup>由于“互联经济”概念提出时间不长，针对此概念的理论文献目前还没有。



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如蒸汽轮船、铁路和电报等交通通讯技术革命极大地降低了贸易成本；二是随着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思想的传播，使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放松了对贸易的限制，诸如对进口关税的限制；三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采用的金本位制使资本能够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这使国家不必担忧货币价值和其他金融问题的任意变化。<sup>⑤</sup>以上三个方面的变革为亚太互联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理论指导和要素流动的多方面基础。

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将20世纪最后十年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生的重要转变归纳为三个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竞争的终结、挑战“华盛顿共识”的新兴经济体的最优对外经济战略，以及美国在单极国际结构霸权的延续。对上述转变的深刻理解，需要关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相互影响。<sup>⑥</sup>除此以外，马克·希利（Mark Hiley）认为，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环境和国内比较优势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变和再调整，特别是亚洲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工业化进程和出口模式的变化，加速了上述结构转变。<sup>⑦</sup>正是这种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不断蔓延，由此加速

---

<sup>⑤</sup>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11.

<sup>⑥</sup>Michael Mastanduno, “Models, markets, and power: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Asia-Pacific, 1989–199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ume 26, Issue 4, October 2000, pp. 493-507.

<sup>⑦</sup>Mark Hiley, “The dynamics of 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ume 4, Issue 3, 1999, pp.446-467.



了该地区互联经济的深入发展。

目前,亚太互联经济已经进入深度一体化阶段,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震惊了世界。魏燕慎认为,早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亚太地区“增长三角”经济合作区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增长三角”成为新的经济合作形式。<sup>⑧</sup>正如高连福强调,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造就了“亚太世纪”之说的成立,即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东亚地区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sup>⑨</sup>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彭思达等认为,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中,美国通过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经济结构升级和转移效应、经济互补效应以及各国间经济制度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对亚太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使美国在亚太经济格局中的超强地位进一步强化。<sup>⑩</sup>对于亚太地区的国际规则,高程认为,美国改变对国际规则的战略定位和操纵方式体现在其对外政策上,其一是将构建规则网络的重点由全球范围转向亚太地区,其二是建立以发达国家集团诉求为基础的国际经济规则圈。<sup>11</sup>李俊江也强调,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亚太经济战略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国以亚太地区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以贸易、投资与技术输出和经济援助为手段,

<sup>⑧</sup>魏燕慎:《‘增长三角’——亚太经济合作的崭新模式》,载《当代亚太》1995年第2期,第7~12页。

<sup>⑨</sup>高连福:《走向21世纪的亚太经济格局》,载《当代亚太》1995年第2期,第2~7页。

<sup>⑩</sup>彭思达、陈继勇、潘黎:《论亚太经济格局变化中的‘新经济’因素》,载《亚太经济》2006年第2期,第7~14页。

<sup>11</sup>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1~97页。



全方位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加深与亚太各国的经济联系。<sup>12</sup>

现实中，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正是这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造就了国家比较优势的不同。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生产体系经历了以进口替代促进出口导向的“雁行模式”

(Flying Geese Pattern)，演进到现在盛行的错综复杂的价值链体系，这种分工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现实应用（更确切地说是竞争优势）。21世纪初，“雁行模式”的更迭体现了亚太产业的转型与转移，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的制造业也正在崛起，这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的工业化。目前，一方面，亚太互联经济格局出现了动态变化，国家间在经济产业结构上的更迭使亚太经济结构呈现重构的趋势。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行逆全球化之道的美国，正联合亚太的政治盟友并利用国际经贸新规则，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展开了大国关系的博弈；另一方面，国际秩序重构（或国际规则的重塑）与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虽然两者是沿着两条轨迹并行发生的，但彼此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所以，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国际秩序重构如何影响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重构。

亚太互联经济的深入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强有力的支撑和佐证。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区域价值链(Regional Value

<sup>12</sup>李俊江：《美国亚太经济新战略与中美关系走向》，载《世界经济》1995年第8期，第61～66页。



Chains, RVCs) 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 更是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力。本文的创新之处: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亚太国家之间内生变量(主要指国家间经济产业结构的重构)的变化与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博弈, 将对亚太互联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国家间政治角力还会对其发展形成一定阻力。本文还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模拟, 以实证方法阐释美国保护主义的严重后果。

## 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重构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 也是当代全球价值链的发源地和成长地, 包含世界上最大的“总部经济体”——美国和最大的“工厂经济体”——中国。亚太地区是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 也是上述大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亚太地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曾经贫困落后, 通过融入全球或区域价值链, 依靠参与相对低端的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s)开启了新一轮的工业化, 从而一定程度壮大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些国家经济的日益崛起, 是否给该地区互联经济格局的重构带来原动力?

### (一)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重构

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依然遵循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林毅夫等认为,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的



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也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sup>13</sup>全球化是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发挥其比较优势的现实背景，其发展程度也是各经济体融入价值链分工的深度体现。

如何衡量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程度？一般的方法是用一国的出口贸易占一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表示，随着经济学方法的演进，目前则可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一些国际贸易指标加以测度。根据2016年12月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本文整理了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后向关联”指数，该指数表示一国出口贸易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份额。表1矩阵的主对角线数据是国家出口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矩阵中的其他数据是后向关联指数。矩阵的行向数据表示国家出口贸易中外国增加值在亚太地区来源地所占份额的情况，列向数据则表示每个国家为其他国家出口贡献的本国的增加值（不包含主对角线上数据）。该矩阵反映了亚太主要经济体的互联经济发展程度，也深刻体现了经济体之间在生产、贸易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借助后向关联指数矩阵，我们可以发现，当前亚太地区互联经济格局表现为：第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较高，这表明其国内产业实力雄厚。同时，它们对

<sup>13</sup>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4~20页。



其他经济体出口贸易的贡献也较大，通过矩阵列向的后向关联指数能够看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比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除外）的贡献明显要高（其中，美、日、澳这三个国家对别国的后向关联指数超过 2% 的国家较多，见表 1 中的阴影）。但是，美国和日本彼此在对方出口中贡献的增加值份额并不高，这表明其存在竞争关系；第二，新兴经济体出口贸易的国内增加值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韩国和中国也较为显著，但是中国和韩国提供给其他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外国增加值份额普遍较高（见表 1 的中国与韩国的阴影）。这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价值链的“中枢”（Hubs）；第三，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深入参与了亚太互联经济之中，它们的出口贸易中包含了大量中国、日本和韩国提供的外国增加值，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价值链上下游关系。同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出口中包含的中间品（见表 1 中的阴影，这里是后向关联指数大于 1% 的部分），并掀起了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第四，鉴于地理和区域贸易协定原因，北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联度也很高，同样，东南亚和东亚经济体之间的互联经济程度也较高。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基本可以勾勒出上述国家在亚太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利益关系，为下文的定性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表 1 2011 年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出口贸易的后向关联矩阵，单位：%

出口增加值来源国 \ 出口国	加拿大	墨西哥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智利	新西兰	中国	韩国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越南
加拿大	76.5	1.1	9.4	0.2	1.1	0.2		1.6	0.4	0.1	0.1	0.1		0.1	
墨西哥	1.2	68.3	11.6	0.3	2.4	0.3		4.2	1.2	0.2	0.3	0.2	0.1	0.2	0.1
美国	2.2	1.3	85	0.2	1	0.1		1.6	0.4	0.1	0.1	0.1		0.1	
澳大利亚	0.2	0.1	1.5	86.1	0.8	0.1	0.5	1.1	0.2	0.3	0.7	0.8		0.4	0.3
日本	0.3	0.1	1.6	1	85.3	0.2		2.2	0.6	0.2	0.4	0.7	0.1	0.2	0.1
智利	0.6	0.4	3.5	0.3	0.4	79.8		1.3	0.2	0.1	0.1	0.1			
新西兰	0.3	0.1	1.4	2.9	0.5	0.1	83.2	1	0.2	0.2	0.5	0.4	0.1	0.4	0.1
中国	0.5	0.2	3	1.3	4.7	0.4	0.1	67.9	2.7	0.5	0.8	0.7	0.3	0.6	0.2
韩国	0.7	0.3	3.6	2.3	5	0.4	0.1	4.7	58.4	0.3	0.6	1.5	0.2	0.5	0.3
泰国	0.4	0.2	2.7	1.8	6	0.2	0.1	4	1.3	61	1.4	1.4	0.4	1.1	0.3
马来西亚	0.4	0.1	4.2	1.3	4.8	0.2	0.1	4.5	1.4	1.4	59.4	2.4	0.4	2.5	0.6
印度尼西亚	0.2		0.7	0.4	1.0	0.1		1.3	0.6	0.4	0.6	88	0.1	0.5	0.1
菲律宾	0.2	0.1	2.4	0.6	2.5	0.1	0.1	2.4	1.2	0.6	0.6	1.1	76.5	0.9	0.2
新加坡	0.5	0.1	5.1	1.3	3	0.1	0.2	3.1	1.2	0.7	1.3	1.7	0.4	58.3	0.2
越南	0.3	0.1	2.1	1.4	3.7	0.2	0.1	6.3	2.9	1.5	1.2	1.2	0.3	0.8	63.7

资料来源：参见 OECD/WTO 增加值贸易数据库（2016 年 12 月版），<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r=155628>。其中，矩阵主对角线数据为国家出口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占份额，其他数据为出口贸易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份额，空格处为零。

## （二）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下的国家利益关系

由于亚太地区国家众多，国家之间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差异较大且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种特性所形成的国家比较优势有



利于促进亚太互联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在亚太互联经济的演化进程中，比较优势理论依然是每个国家融入其中的利益分配的理论基础。亚太互联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催化效应，所以，国家的投资动机和地区战略会影响亚太互联经济格局与秩序。

亚太地区的互联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互联经济被称为“亚洲工厂”，其体现在高度集中参与国际分工垂直生产的共享模式。在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掀起的新一轮工业化过程中，一些产业借助“雁行模式”向这些国家转移，也延长了垂直分工的价值链长度。在这种垂直分工下，促成了区域内“三角形产品流动”的模式，具体表现为：第一，亚太价值链上游经济体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第二，中国等国家加工组装这些中间产品成为最终消费品；第三，这些最终消费品再出口到全球比较大的消费市场，如美国和欧盟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亚太互联经济中的作用也可以通过上述后向关联指数得以体现。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并成为连接上下游环节的“中枢”，但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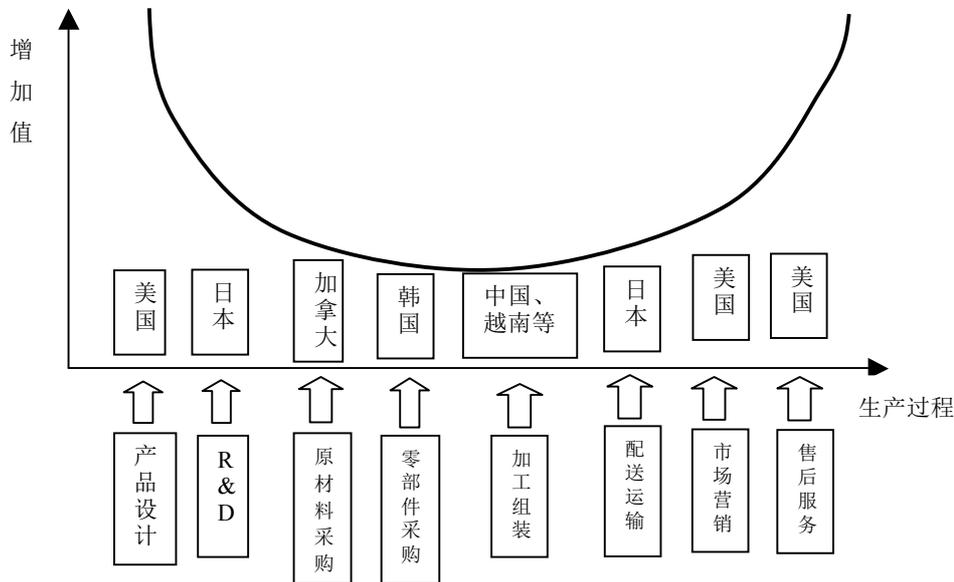


图1 亚太地区产品内价值创造的“微笑曲线”示意图

从经济体在亚太互联经济中的获益角度来看，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基本上占据了“微笑曲线”的设计、营销等高增加值环节，分布在低增加值环节的不仅有中国，还有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其中一些曾经贫困的国家因参与了全球价值链而经济状况不断改善（见图1），这是当前亚太地区生产、经贸联系的基本格局。但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演进，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也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而发生。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通过增强自身全球竞争力，欲以提升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发达经济体试图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以削弱中国等国家的国际地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上述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如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和威廉·肖（William Shaw）提出的朱格诺（Juggernaut）



是一种搅动格局的强大力量，新兴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甚至方式，冲击着原有的世界格局、考验着现有的国际秩序。<sup>14</sup>但无论如何，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亚太互联经济中的依存与竞合关系将始终存在，经济体之间利益的博弈和地位变化将在互联经济格局的重构中动态演进。

### 三、国际秩序重构对亚太互联经济格局形成的挑战

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阐释了亚洲发展奇迹的神话，东亚非凡的增长只不过是投入的迅速增长创造的，这极大地影响了关于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传统认识。东亚经济的成功及其所形成的共同的“亚洲体制”可能会证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经济政策是错误的。<sup>15</sup>可见，亚太互联经济发展不仅要从经济层面分析，还需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判。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政治角力会对亚太互联经济形成新的挑战，尤其是美国以非中性的国际经贸规则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国之间的攻守博弈深入展开。下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阐述国际秩序重构对亚太互联经济格局形成的挑战。

#### （一）国际规则与秩序重构：逆全球化会搅动亚太互联经济现有

<sup>14</sup> 尤里·达杜什、威廉·肖：《2050：重塑世界的朱格诺》，周子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sup>15</sup>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6, Nov/Dec, 1994, p.62-78.



## 格局与秩序

逆全球化 (De-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顾名思义就是指把全世界各国和地区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相互依赖及整合回退的一个过程。庞中英认为,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逆全球化不断普及就变成了另一种全球化, 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sup>16</sup>近几年来, 逆全球化浪潮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 主要表现形式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等。在经济方面, 一些国家利用各种政策壁垒, 限制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人为制造各种经贸政策的障碍, 已经阻碍了亚太互联经济的深入发展。在政治方面, 逆全球化导致国际规则与秩序的严重失灵。当然, 逆全球化不仅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产生影响, 还涵盖全球正义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国际秩序的重构。

尽管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相对统一的国际秩序, 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却认为, 隐藏在这种“美国式全球化”中的潜在问题也开始显现, 如金融系统和全球储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sup>17</sup>在经济层面, 由金融问题带来的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是引致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认为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显著的收益, 而非之前认为的与发展中国家是零和

<sup>16</sup> 庞中英:《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2 期, 第 5~11 页。

<sup>17</sup> Joseph Stiglitz,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Cancun and recent financial crises”, in Ernesto Zedillo edited,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Explorations in light of recent turbu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博弈。实际上，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其利用国际规则和先发优势的主导权，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范黎波等研究进一步发现，发达国家内部各阶层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也不均衡，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中下阶层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sup>18</sup>蔡昉也对全球化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并认为，全球化能否使所有国家以及一国全体居民均等获益，在于良好治理全球化以合理分配“蛋糕”的做法。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国内经济社会政策跟不上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步伐，造成就业流失和收入下降，成为全球化发展的“输家”。<sup>19</sup>

逆全球化往往隐匿在一些国际规则的背后，以建立新规则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张宇燕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基于此，他首次提出了“再全球化”的概念。<sup>20</su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是美国在亚太区域削弱中国崛起的区域经济战略。2015年，美国公布 TPP 文本中的“原产地规则”，该规则目的是“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者”。<sup>21</sup>原产地规则规定了区域累积原则，即某一成员国生产产品时，任何成员国提供的原材料与来自于其他 TPP 成员国的原材料同等看待。另外，TPP 中“纺织和服装”章节提出了“从纺纱开始”（Yarn-forward）就更为苛严的

<sup>18</sup>范黎波、施屹舟：《理性看待和正确应对‘逆全球化’现象》，载《光明日报》2017年4月2日，第7版。

<sup>19</sup>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4~24页。

<sup>20</sup>张宇燕：《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第1页。

<sup>21</sup>Rules of Origin and Origin Procedures, Chapter 3 in TPP Text, 2015.



原产地规则，即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到加工成成衣都必须在 TPP 成员国境内完成。<sup>22</sup>其中，仅对“短缺清单”中的产品允许使用非成员国供应的特定纱线和纤维织物为原料。上述两条新规则突显 TPP 对非成员国的排斥。如果 TPP 最终通过，这些条款将促进 TPP 成员国之间在生产和供应链方面的整合，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割裂了与非成员国的经贸联系，将严重影响亚太价值链的健康发展。在互联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均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方。在国际经济规则日益向开放、包容、互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任何国家已无法复制殖民地时期强者对弱小国家完全的经济“掠夺”。尽管国家或地区之间发展水平还存在明显的差异，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下的公平交易依然是国际经济规则发展的主流方向和各国不断追求的最优准则。

综上，逆全球化对亚太互联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及后果表现为：第一，逆全球化往往通过亚太价值链的上下游传导属性，破坏或改变亚太互联经济的现有格局。由于亚太地区参与价值链的国家利益相互交织，逆全球化行为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改变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秩序；第二，逆全球化行为会通过国际规则抬高亚太互联经济的各种壁垒和成本，切断互联互通的多个途径，从而降低了互联经济体的整

<sup>22</sup>刘中伟：《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126~156页。



体福利，使交易双方均遭受损失；<sup>23</sup>第三，在互联经济条件下，逆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将无法实现经济利益零和博弈的结果。这也印证了“人类所有的文明都建立在某种贸易之上”<sup>24</sup>的论断，而强权者无法实现其贪婪与垄断的不公平交易。

## （二）全球经济治理：亚太区域一体化碎片化的整合

随着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投资协定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多边贸易体制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又致使协定之间互掣肘、低效无序，特别是边界内纷繁复杂的规则阻碍了资源配置。因此，如何通过整合碎片化来化解各种协定造成一体化进程的不稳定性，也是亚太区域经济治理的重点关注。

过去十几年，亚太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形成了以某几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为轴心的中心——辐条体系，随着亚太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呈指数增长，各层级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交织，使得亚太地区也陷入了错综复杂的“亚洲面碗”效应。<sup>25</sup>在逆全球化蔓延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很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美国退出 TPP 之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由美国主导的 TPP 和东亚

<sup>23</sup>例如，假设国家 A 生产电脑，然后用电脑去交易国家 B 的面包。如果 A 国以抬高关税限制进口面包，看似是贸易双方的竞争，实则是 A 国产业间的竞争。A 国面包进口的减少，会迫使建立生产面包的企业，这样就会分摊电脑行业的生产资源和禀赋，导致 A 国电脑行业竞争力的下降。B 国面包出口减少，生产面包的企业发展受阻，B 国购买 A 国的电脑也会减少，最终两国的优势产业均受损。

<sup>24</sup>蒂姆·哈福德《自由贸易到底有什么好处？》，新华网，2017 年 3 月 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01/c\\_129499059.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01/c_129499059.htm)。

<sup>25</sup>盛斌、果婷：《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博弈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0 期，第 4~21 页。



国家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两种轨道构成。TPP 搁浅之后，RCEP 有望成为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核心。美国退出 TPP 也使得 RCEP 的意义变得更大。多数学者认为，RCEP 有可能取代 TPP 成为未来协定的典范，是当前最有可能实现的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尽管 RCEP 谈判进展有所提速，但在关税和服务业等问题上仍存在争议。TPP 和 RCEP 曾经对立的两个巨型自由贸易协定(FTA)，现在一个谈判搁浅，一个谈判向前不断推进，这种格局的整合直接影响着亚太地区互联经济的发展。

RCEP 嵌套式的区域一体化格局与多边式的 TPP 格局不同，它可以对既有承诺和规则条款进行整合，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协定的内容。RCEP 能包容各成员的异质性，它可以接受低层次的协定条款并向纵深条款发展，这不同于 TPP 执行达成的最终一揽子协定。这表明，RCEP 能以更大的包容性促进成员间的互联互通，以层次多元化带动亚太地区互联经济的持续发展。TPP 则不然，它更强调高标准的最终层级协定的实现，其中某些条款就有可能阻碍一些成员国参与协定，更会使想融入其中的非成员国望尘莫及。其结果将导致亚太地区价值链出现断裂，从而破坏亚太互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 RCEP 涵盖的范围和谈判进展来看，其能促进太平洋西岸的亚太互联经济的深入发展，但是很难成为亚洲乃至亚太地区多数国家都认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板。<sup>26</sup>同时，

<sup>26</sup>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7）——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5 月版，第 69~84 页。



RCEP 涉及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以东盟自贸区为中心的“轴心—辐条”结构因缺少美国，注定其无法引领 21 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发展方向。如何搭建一个包容各方、利益大体均衡的亚太共同秩序，是解决由区域协定碎片化导致互联经济不稳定的有效手段。

国际投资政策也影响着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格局。亚太地区双边投资协定数量的不断增长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亚太经济的繁荣，双边投资协定提高了外资的待遇标准和保护水平，极大地激发了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活动。根据《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国际投资协定总数在 2016 年底已达 3324 个，<sup>27</sup>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将继续扩大，变得更为庞杂。但是，由于当前区域投资协定条款繁多、国际投资体制日益碎片化，投资者——国家的权力义务严重失衡，而且不能有效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sup>28</sup>纷繁复杂的投资协定导致国际投资争端有增无减，由此形成投资发展的羁绊。因此，亚太地区不断增多的双边投资协定带来的碎片化问题，同样将产生投资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所以，全球投资治理方案旨在促进亚太经济稳定，通过建立全球多边投资体制，努力达成全面统一的国际投资协定或者区域投资协定，更有利于亚太互联经济发展。

<sup>27</sup>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UNCTAD, June 2017.

<sup>28</sup> 詹晓宁：《全球投资治理新路径——解读〈G20 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10 期，第 4~18 页。



### （三）政治经济博弈：大国博弈冲击亚太互联经济构架

随着亚太区域在全球地缘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主要大国都想在此谋求战略利益，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博弈也愈加强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最能反映大国之间力量博弈的结果。毋庸置疑，美国和中国是亚太区域政治经济构架中的核心国家。当前，美国逆全球化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与能和美国抗衡的大国深度博弈，与美国经济利益有冲突的国家相比较量，中国等国家则是美国博弈的主要对象。无论在外交还是经济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将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日益激烈。美国与其周边国家的经济博弈也日趋凸显，这些都冲击着亚太区域经济构架原本相对稳定的格局。

中美关系影响中美经贸发展，同时，中美贸易冲突也可能破坏已建立了四十多年的中美国际关系。王缉思认为，亚太政治经济格局处在历史性的剧烈变动之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即双方合作与竞争同时加强——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以及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性增强。<sup>29</sup>无论是奥巴马倡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针对中国打造的“东海南海争端链”的亚太地区政治战略，归根到底都是美国欲争夺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伴随亚太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也不断调整亚太战略，加剧了区域架构的变动——既包括经济的变动，也包含政治关系的变动。此外，美国和日本

<sup>29</sup>王缉思：《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常态”》，环球网评论，2016年8月19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8/9330046.html>。



等国家合力牵制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空间拓展，越来越偏离“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美国还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打造亚太联盟，从军事、经济两方面围堵中国，中美之间的角力全面升级。正是由于亚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过于松散和复杂，美国与一些亚太国家“抱团”对华，导致区域政治构架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区域经济构架。

同样，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也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发展。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对墨西哥实施经济封锁和打击，有可能使墨西哥三十年的改革毁于一旦。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墙不仅阻碍了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在高墙建起的同时，隔膜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心墙”也高高筑起。目前，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2016年，美国对墨西哥货物贸易出口额为2309.6亿美元。<sup>30</sup>两国的供应链相互依存，美国的半成品和零部件运到墨西哥进行生产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再运回美国销售。同时，美国有600万个工作岗位依赖于与墨西哥的双边贸易。<sup>31</sup>所以，无论从地缘政治、双边关系和贸易自由化，还是墨西哥自身的经济体量来看，其都不会容忍美国政府的经济威胁。如果美墨间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相互受损，不仅影响东太平洋地区的互联经济格局，更会破坏日益成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因此，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博弈给亚太互联经济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在亚太国家所形成的政治联盟，可能会孤立

<sup>30</sup>参见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统计数据，<https://www.commerce.gov>。

<sup>31</sup>参见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统计数据，<https://www.uschamber.com>。



和破坏以中国为核心价值链体系。特别是美国欲通过在东亚不断扩张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部署，给中国在东亚生产体系中造成压力；二是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战略变数已经破坏了日臻完善的北美自贸区体系，经济上的纠葛可能会引起该地区政治和经济构架的紧张，严重打击了北美国家一体化进程。

#### 四、美国“新重商主义”给亚太互联经济造成不确定性

特朗普自竞选总统之时，就继承了16世纪殖民主义时期重商主义的某些贸易观。尽管特朗普的贸易观与殖民时期的重商主义有很大区别，但其仍强调通过提高关税与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我们称之为“新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的手段虽已过时，但其对抗式的姿态无疑让美国人再度想象“美国的强大”。特朗普政府试图使用政策组合重塑美国经济乃至国际经济秩序，但这已违背全球化的本质，给互联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不确定性，并将重蹈从开放到封闭的覆辙。

##### （一）亚太战略转变使美国偏离亚太互联经济

尽管奥巴马时代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Pivot to Asia-Pacific）会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力，从而弱化其他亚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力图使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手段全方位布局亚太，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制衡中国的崛起。从经济方面看，重返亚太战略不会使亚太互联经济程度降



低，反而可能会由于美国政策倾向亚太而更具有操控力，使美国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

奥巴马在其任期内努力推进以 TPP 为代表的重返亚太战略，以此将更多的资源重新投向亚太地区。客观地讲，TPP 以区域多边机制作为扩大美国利益的手段，试图利用高标准条款统一成员国的监管体系，并以此实施遏制中国崛起的“平衡中国战略”。奥巴马承认，TPP 意在阻碍中国在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亚太地区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确保美国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sup>32</sup>由此可见，TPP 对于美国的规则收益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收益。TPP 构建的国际经济新规则破坏了亚太经济互联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将造成区域价值链的断裂或者产业运行效率的下降。所以，中国和其他非成员国要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美国偏向自身利益、排他性的国际规则，共同捍卫亚太地区的核心利益。

特朗普以反主流的政见主张当选总统后，立即宣布退出 TPP，并利用双边框架推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杰克逊式的民族主义。杰克逊主义外交政策是以捍卫和保护美国国家利益为第一要务，推动贸易伙伴与美国建立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关系。尽管历任美国总统都承诺捍卫美国利益，但自二战结束以来，两党的总统都把这种努力包裹在广泛的自由民主秩序之中。特朗普试图通过一些保护手段重

<sup>32</sup>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一带一路’之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第29～43页。



振美国制造业、扩大国内就业，为了防止美国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甚至还提出对搬离本土的美国公司征收重税。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将遵循两个简单原则：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sup>33</sup>而支撑特朗普奉行上述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思想内核，是自由贸易让其他国家变得富有，但剥夺了美国的财富、实力和自信。随着特朗普宣布退出 TPP 后，旨在通过“亚太再平衡”实现美国利益至上的经济战略彻底陨落。

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战略，将使美国偏离亚太互联经济发展理念。“美国优先”会使美国经济由开放向封闭倒退，它完全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相背离，也与亚太互联经济不断深化的地区发展严重脱钩。杰克逊主义是 19 世纪美国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遗物，此外，美国政府也早已完全否定了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倡导的那种“美国优先”愿景，这也就决定了“美国优先”不可能在互联经济深入发展的当今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有效政策工具。其造成的后果将是：第一，“美国优先”政策极易引发一系列保护主义行为，不仅会冲击亚太地区现有的价值链体系，还可能会深刻影响以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为主的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结构。“美国优先”最直接的是要对其国内产业进行保护，保护手段包括提高进口产品关税，甚至是进口限制以及其他保护措施。由此产生美国

<sup>33</sup>2017 年 4 月 18 日，特朗普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正式签署了“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行政令，  
<https://edition.cnn.com/2017/04/17/politics/trump-wisconsin-buy-american/index.html>。



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会阻碍亚太价值链产能的正常输出，尤其是为美国市场提供大量最终消费品的国家的出口会遭受极大冲击，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第二，从亚太互联经济视角看，美国已经深度参与了亚太地区价值链体系，而排斥互利共赢的“美国优先”将让亚太互联经济遭受无序状态，美国也会因此成为新的边缘国家。

“美国优先”政策体现在实体经济层面是要使“制造业回流”，以此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但在美国高昂的各种生产成本下，想让美国跨国企业回流，最终结果必定是事与愿违，因为企业行为是以成本最小化驱动的。对亚太经济而言，美国“制造业回流”策略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会对原本健康发展中的亚太互联经济造成釜底抽薪的后果。依此下去，美国开放型经济会在部分领域逐渐变得固步自封，那么，美国经济在亚太地区也会日渐孤立。

## （二）美国区域贸易协定调整将增加亚太互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贸易协定解体和重新谈判都可能会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贸易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造成伤害。美国推行已久的“自上而下”的“规则重构模式”，遭到特朗普政府的逐步瓦解，他一上任便宣布退出了 TPP，并开始谋划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将会冲击亚太多边一体化进程和亚太互联经济发展。

1、在“后 TPP 时代”（美国退出 TPP 之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



化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特朗普退出 TPP 之初，剩下的 11 个 TPP 成员国看到 TPP 前途渺茫，便开始寻找别的机会签署自贸协定，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如马来西亚已经关注 RCEP，因为 RCEP 既包括 10 个东南亚联盟国家，也包括亚太地区的 6 个国家，特别是包含 TPP 中的加拿大、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家，而它们均未与马来西亚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sup>34</sup>在特朗普退出 TPP 一年之后，以日本和加拿大为代表的 11 个成员国继续努力推进 TPP，签署了名为“全面且进步”的 TPP。<sup>35</sup>但是，新协定中原来存在诸多争议的条款被搁置，这表明原来 TPP 高标准将会缩水，也降低了协定在各成员国通过的难度。第二，即便“美国因素”不复存在，中国也无意于 TPP，不会把 TPP 作为下阶段亚太一体化路线图，而是以既有的方式推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2016 年，在秘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为亚太国家选择区域贸易提供了一个平台，也给中国积极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努力推动的 RCEP 强调渐进性和开放性，在协定中安排取消关税时间表等措施。在 RCEP 条款设置上，中国更注重传统的关税和市场准入等内容，与日本和澳大利亚提出的覆盖服务业、投资以及知识产权等高标准条款无法融合，谈判进程中双方博弈和角力正日渐升温。第三，以日本为代表的 11 个 TPP

<sup>34</sup>马涛：《中美在亚太地区经贸发展的竞合》，载《东方早报》2016 年 12 月 13 日，第 14 版。

<sup>35</sup>2018 年 3 月 8 日，日本等 11 国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10/c\\_129826490\\_2.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10/c_129826490_2.htm)。



成员国一直为美国重返 TPP 敞开大门。在 2018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执着于和贸易对手进行双边谈判的特朗普表示，对重返 TPP 持开放态度，前提是“能敲定一个比之前好得多的协定”，<sup>36</sup>此举颇让人感到意外。

美国退出 TPP 又意欲重返 TPP，这无形中增加了亚太互联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改变了美国区域贸易主义和中国自由贸易主义两大阵营的博弈格局。客观上说，美国主导的 TPP 搁浅确是一个高标准亚太区域贸易协定的损失，如不考虑其排他性的战略意图，TPP 协定达成会在局部区域范围提升亚太互联经济发展质量，并会产生溢出效应。当然，进展顺利的 RCEP 谈判也助推了中国在亚太区域的话语权，TPP 的搁浅以及“全面且进步”TPP 的签署更多意味着 RCEP 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地位的逆转。RCEP 覆盖的亚太国家更多，其谈判条款标准虽较 TPP 低，但快速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贸易协定也面临一定困难，并存在政策的不确定性。

2、在 NAFTA 重新谈判方面，特朗普为了迎合其国内核心选民，就任后便扬言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是其“美国优先”计划的一个关键支柱。NAFTA 是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主要阵地之一，协定成立以来的区内贸易发展对北美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美国从提出退出北美自贸区，到当前阶段与墨西哥、加拿大进行该协定的重新谈判，其目的

<sup>36</sup>2018 年 1 月 25 日，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间隙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网址：<http://news.163.com/18/0126/07/D92GHFMD000187V9.html>。



是要实现所谓的“公平贸易”。很显然，无论特朗普政府是要退出 NAFTA，还是对这个存在了 24 年之久的贸易协定进行重新磋商，目的都是促进美国出口、增加就业岗位，削减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实际上，特朗普上任一年以来，其在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2017 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同比增长了 12.1%，而美中贸易逆差增加了 8.1%。<sup>37</sup>NAFTA 每年协定内的贸易额超过 1 万亿美元，并构建了美国企业赖以生存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供应链。<sup>38</sup>如果协定磋商失败，北美贸易将受到重创，直接影响亚太东部地区互联经济发展。

从谈判的进程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与美国仅完成了协定中争议较小章节的修改，在棘手议题的谈判上未获得突破。由于难以估量北美三国分歧的深度，重谈 NAFTA 也面临多重困境。一是在 NAFTA 谈判内容上，美国贸易代表处提出以 TPP 条款为参照，试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打造 NAFTA2.0 版本。若以 TPP 条款重新建立高标准的 NAFTA2.0 版，“高难度系数”会使谈判陷入困境；二是对“原产地规则”的分歧表明三国的谈判困难重重。美国提出要提高产品中北美地区的增加值份额，特别设立了美国产出的含量标准，考虑到各自企业的利益，加拿大和墨西哥对后者持反对意见；三是美国在谈判中最具争议的议题，

<sup>37</sup> 美国商务部 2018 年 2 月 6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07/c\\_1122381704.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07/c_1122381704.htm)。

<sup>38</sup> 在 NAFTA 的推动下，2015 年美、加、墨三国贸易额就超过了 1 万亿美元。网址：[http://jckb.xinhuanet.com/2017-07/21/c\\_136460585.htm](http://jckb.xinhuanet.com/2017-07/21/c_136460585.htm)。



包括减少贸易赤字的措施、防止汇率操纵、在政府采购中偏向美国公司的“购买美国货”政策和重订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等，依然难以解决。

重谈 NAFTA 的最终结果无外乎有下面四种情形：第一，加拿大和墨西哥屈从美国的要求，但这是最不可能的结果；第二，美国放弃重谈目标，而是专注于 NAFTA 的现代化，这种情形需要执行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承诺保证数字商务的自由流动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由于特朗普认为 NAFTA 对美国是“一个灾难”，他也就不可能赞同 NAFTA 的现代化；第三，重谈陷入僵局导致 NAFTA 终止。协定终止会扰乱北美供应链并阻止区内投资流动，墨西哥与美国在安全、毒品、移民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将受到威胁，加拿大也要重归终止多年的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CUSFTA）；第四，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三方都让步得以“应付过关”，如墨西哥大举购买天然气、加拿大减少奶制品限制等，此举可以实现政治上的皆大欢喜。<sup>39</sup>由此可见，无论谈判的最终结果如何，重启 NAFTA 谈判将给北美三国紧密的互联经济和政策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 （三）美国保护主义将阻碍亚太互联经济发展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卷土重来。根据《全

<sup>39</sup>Gary Clyde Hufbauer and Euijin Jung, *Scenarios for Concluding the NAFTA Talks*, *Trade & Investment Policy Watch*, Peters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July 24, 2017.



球贸易预警》报告，金融危机以后，关税措施和非关税壁垒分别约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 11%和 8%，贸易救济和国家援助措施均占 24%，出口税或出口限制措施占 6%。<sup>40</sup>深谙“新重商主义”的特朗普，为实现“美国优先”战略，在很多政治战略中都裹挟着经济意图。美国不仅从双边层面实施保护主义，还抵制多边贸易体制，其保护措施将通过价值链的传导机制影响整个亚太互联经济发展。

美国单方面的保护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扩散效应。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为中美巨额贸易顺差忧心忡忡，核心关切还是美国的就业问题。一方面，美国的贸易逆差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和消费需求缺口有关。另一方面，美国大量公司在中国生产产品再出口的亚太互联经济模式，出口中包含了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中间品，造成了中美贸易顺差“虚高”的假象。<sup>41</sup>

特朗普从当选总统就扬言对进口中国的产品征收 45%的惩罚性关税，中美贸易战的火药味愈演愈烈。<sup>42</sup>如果发生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顺差较大的产业将会受到关税提高而带来的冲击，进而影响相关产业的就业。根据美国 1974 年贸易法案，美国总统只能征收为期 150 天、最高为 15%的临时性关税，本文以一年期为例分别以 6%、10%和 15%的进口关税进行三种情形的模拟。根据中美 17 个部门 2009 年的贸易数

<sup>40</sup> Simon J. Evenett edited, *The 11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 on Protectionism*, CEPR, June 2012.

<sup>41</sup> 石建勋：《理性看待中美贸易不平衡》，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 年 4 月 19 日。

<sup>42</sup> 2017 年 8 月 14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决定对中国进行贸易调查，并启动 301 条款，参见

<https://new.qq.com/cmsn/20170815/20170815001484>。



据，美国最可能对中国出口美国最多、造成贸易顺差最大的部门提高关税。<sup>43</sup>

通过筛选中美贸易顺差的部门，按不同水平提高其进口关税，与当年现行的关税水平对比<sup>44</sup>就可以算出中国各顺差部门对美国出口额的减少量。我们发现，中美存在贸易顺差的部门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有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进口关税征收水平的提高，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减少的最多。<sup>45</sup>当关税从 10% 提至 15% 时，存在顺差部门的出口缩减占全部制造业部门出口的近 8% 扩大到近 12.9%（见表 2）。美国如果对中国进口实施重商主义的限制措施，根据互联经济的原理，不仅会对中国向美国出口造成严重损害，同时也损害了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内涵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自身的中间品出口。当然，对于美国在华公司也必然会遭受搬起“保护主义的石头”砸自己脚的后果，如苹果系列产品不仅包含了很多美国产的零部件，最终品还要出口给美国，美国的保护措施在亚太互联经济模式下也会破坏其自身利益，并造成多方利益受损的结果。

<sup>43</sup>根据我国企业的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相近的结论，约在 6%~7% 之间，确定企业的盈亏临界点，因此我们取 6% 进口关税为临界水平关税。

<sup>44</sup>根据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库数据，参见 <https://wits.worldbank.org/>。

<sup>45</sup>马涛、东艳：《构建积极的中美经贸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9 月 11 日第 7 版。



表 2 美国对进口中国产品征收不同关税导致中国出口减少的模拟

单位：百万美元

出口减少 产业	情景 1 (基于 2009 年) 征收 6%进口关税后一 年出口额减少	情景 2 (基于 2009 年) 征收 10%进口关税后一年 出口额减少	情景 3 (基于 2009 年) 征收 15%进口关税后一年 出口额减少
动物		-46	-146
食品			
化工产品	-410	-731	-1132
皮革毛皮制品	-353	-610	-930
木材加工品	-337	-610	-951
纺织和服装	-326	-1619	-3235
鞋类			-574
石器和玻璃制品	-264	-518	-836
金属	-715	-1370	-2189
机械电子	-8224	-13780	-20726
其他制品		-1394	-4117
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	-8594	-14391	-21637
总出口额减少	-19224	-35070	-56472
占全部 17 个制造部门出 口比重	4.37%	7.98%	12.85%

数据来源：分部门的进口关税来自 WITS 数据库，参见 <https://wits.worldbank.org/>。之所以基于 2009 年的贸易数据进行模拟，是为了和下文的就业模拟在时间上对应，因为就业的模拟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D)，而最新的数据是 2009 年。

下文模拟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就业造成的影响。我们利用全球价值链体系统计下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D) 中社会经济账户的三种劳动力构建模拟方程。<sup>46</sup>根据上文假设美国依然对来自中国产品征收 6%、10%和 15%的进口关税，造成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从而模拟对中国就

<sup>46</sup>根据里昂惕夫恒等式  $X=AX+Y$ ，有  $X=(I-A)^{-1}Y$ ，我们构建变量  $K$ ，矩阵  $K$  中的元素是利用生产要素  $f$  创造的产出  $x$  的增加值份额，其中  $K=F(I-A)^{-1}$ 。我们把上述模型拓展为中美之间的模型： $Q = F(I-A)^{-1}E_{US-China}$ ，其中，向量  $E$  是中美分部门的出口额， $(I-A)^{-1}$  是里昂惕夫逆矩阵， $A$  是中美之间中间投入品消费系数矩阵。 $F$  是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向量。 $[F(I-A)^{-1}]^T$  是  $F(I-A)^{-1}$  的转置矩阵， $\#$  代表两个矩阵对应元素相乘，于是有， $\Delta Q = [F(I-A)^{-1}]^T \# \Delta E_{US-China}$ 。



业的影响。按照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D），把劳动力划分为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三种类型，这里就业的计量单位是劳动力的工作时间，而非就业数量。

表 3 美国对进口中国产品征收不同关税导致中国就业减少的模拟

单位：百万工作小时

	情景 1（基于 2009 年） 征收 6%进口关税后一年 减少的就业量	情景 2（基于 2009 年） 征收 10%进口关税后一年 减少的就业量	情景 3（基于 2009 年） 征收 15%进口关税后一年 减少的就业量
高技能劳动力减少的 工作时间	5.49	10.02	16.13
中等技能劳动力减少的 工作时间	40.15	73.31	118.05
低技能劳动力减少的 工作时间	99.22	181.18	291.75
全部劳动力减少的工 作时间	144.85	264.50	425.93

数据来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计算的结果，参见 <http://www.wiod.org/home>。

通过模拟，我们发现三种情景下，随着美国对进口中国的产品提高关税，三种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均大幅减少，其中就业时间减少最多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其次是中等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较前两者减少的数量轻微一些。由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较大，两国贸易冲突对中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就业冲击最大（见表 3）。实际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不仅对中国就业造成影响，从中国目前在亚太价值链所处的位置来看（见图 1），也必定会影响中国上下游国家的



就业，对亚太互联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会造成链条断裂式的重创。例如，中国和墨西哥占到美国全部贸易的四分之一，如果贸易冲突全面爆发，美国私营部门的就业将会减少近 480 万个，供应链也会遭受严重破坏。

47

## 五、中国的战略措施与角色

在亚太互联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参与国家和地区众多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繁文缛节的各种规则和协定因提高了各种成本，阻碍了一些国家参与亚太地区价值链。只有构建一个大多数国家都认可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促进亚太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在亚太互联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和发展理念，对亚太互联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 （一）亚太自由贸易区能正确引导地区国际经济秩序重构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由来已久，早在 2003 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罗伯特·斯考利（Robert Scully）提出，应该整合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区域贸易安排，为以后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TAAP）奠定基础。

<sup>48</sup>某种程度上，亚太自贸区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愿景。FTAAP 致力于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雄心水平，打

<sup>47</sup> 参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分析，<https://piie.com/>。

<sup>48</sup> Robert Scully, *Proliferation of RTAs and the Futur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APEC Study Center Consortium Meeting, Phuket, May 2003.



破传统贸易壁垒以外的其他制度性障碍，加强“跨边界”的供应链连接，改善“边界内”的商业环境，有效衔接“后茂物目标”时代 APEC 合作进程。<sup>49</sup>长久以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合作相对滞后，一直缺乏整体性合作制度安排，而更多体现为危机应对型合作，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谈判举步维艰。鉴于当前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形式越来越多边化，需要一个标准相对统一、范围更广的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引领亚太区域经贸发展。启动 FTAAP 谈判，将会整合目前不断增加的亚太区域贸易协定，代表着亚太区域经一体化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FTAAP 需要先要获得成员经济体的充分认可，再推进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2014 年，在中国举办的 APEC 会议再次重申了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性，并倡导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始终坚持倡导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面对当前中美在亚太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主导权发生的变化，中国应该顺势抓住主动权，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美国退出 TPP，导致 TPP 某些成员国开始寻找在亚太地区的“替代选项”，这促使它们更加关注中国提出的政策主张。TPP 的搁浅为中国在亚太区域打造替代性的贸易协定清除了障碍。中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在 2016 年秘鲁举行的 APEC 峰会上已经得到与会国的关注，这也使得那些刚刚因丢掉 TPP 而心存渺茫的国家能重拾希望。<sup>50</sup>FTAAP 可以选择将

<sup>49</sup>孟夏、陈立英：《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FTAAP 问题分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第 95~104 页。

<sup>50</sup>马涛：《中美在亚太地区经贸发展的竞合》，载《东方早报》2016 年 12 月 13 日第 14 版。



已有次区域安排中的“共同因素”及各成员经济体能够凝聚共识的部分问题先纳入到其框架下，优先满足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目标。<sup>51</sup>从当前利益关系看，中国与美国共同参与的 FTAAP 将是“后 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该协定的达成将书写 21 世纪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其释放的经济红利也会大于任何已有自由贸易区。

第二，FTAAP 标准体现了亚太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内在要求，其谈判的尽早启动以及协定的最终达成，将会促进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互联经济的发展。包容性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能充分考虑各经济体的不同需求，将国际秩序重构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纳入其中。它将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有机会参与地区价值链，也有利于亚太区域一体化合作重回 APEC 制度框架。当然，FTAAP 的建立也可以为 APEC 确立一个更高标准的“后茂物目标”，推动 APEC 向更高效的合作机制发展。另外，亚太自由贸易区还将为整合本地区的区域贸易安排、化解区域合作的碎片化挑战，为未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指明方向。<sup>52</sup>

## （二）化解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亚太互联经济成本

当前，全球化遭遇“逆风”，所导致的政策不确定让不少人对全球化充满质疑。世界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复苏乏力，贫富两极分化，

<sup>51</sup>盛斌：《亚太自由贸易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选择》，载《国际经济合作》2014 年第 11 期，第 9~12 页。

<sup>52</sup>张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光明前景》，中国外交部，2016 年 11 月 11 日，

[http://un.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414702.shtml](http://un.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414702.shtml)。



南北差距加剧等问题难以解决。全球治理遇到深刻的制度障碍，对全球财富分配无法做出制度安排，贫富差距已经不是富国与穷国的财富对抗，而是全球资本与全球社会的对抗。<sup>53</sup>在全球经贸治理方面，加强亚太互联经济的投资便利化可以化解投资协定过多而产生的成本叠加效应。

第一，化解逆全球化给亚太互联经济增加制度成本。全球化发生逆转的机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认为，是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sup>54</sup>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危机爆发后，没有对公共政策做出及时调整，而是按照惯性思维，循规蹈矩的加以应对，正是这种制度缺陷导致全球化逆转。造成逆全球化的制度缺陷，由此会通过引发的民粹主义对地区经济产生恐慌和其他负面效应，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贸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也难独善其身。所以，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性资源配置的方式，各国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参与全球化进程。由于参与全球化角色不同等原因，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收益差距越来越大，客观上导致了南北发展失衡等问题，产生了赢家和输家。如何遏制逆全球化的势头，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认为，解决方法是对输家予以提供补贴、失业救济、就业培训、医疗保健和教育机会等方面的补偿。<sup>55</sup>

<sup>53</sup>黄仁伟：《从逆全球化到有选择的全球化》，载《新华日报》，2017年5月4日，第11版。

<sup>54</sup>Harold 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http://www.harvard.edu), 2001.

<sup>55</sup>NourielRoubini, "The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Is Real and Growing", World Economic Forum, July 2016,



通过平均分配全球化收益，消除受益差距扩大导致的逆全球化，同时也会有效平衡亚太地区互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均衡问题。

第二，由于跨国投资是亚太互联经济发展的直接推进器，通过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降低成本，进而促进亚太互联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如上文所述，处于经济繁荣发展阶段的亚太地区双边投资协定不断增加，投资政策制定变得越来越复杂、分化和不确定性。投资便利化是联合国贸发会议路线图中五个改革领域之一，它旨在简化投资者的投资扩张以及在东道国的日常业务管理。透明、投资者服务、流程的简化及高效、协调与合作，以及能力建设是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原则。尽管投资便利化措施数量低于投资动机（investment incentives）和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措施数量，在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中的占比不高。但是，有效的投资便利化措施可以动员并引导投资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投资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最大化投资收益，最小化负面效应和外部性。所以，不断扩大投资协定与投资政策中的投资便利化维度（dimension），可以有效降低亚太地区众多投资者的运营成本，对于提升亚太互联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 （三）中国对亚太互联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各国携手共同推进，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倡导者，也是推动亚太地区经济繁



荣发展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广度和深度上促进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联接亚太地区和中东亚以及欧洲北非的经贸往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中国除了提供器物性公共产品，还成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制度性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不仅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还加强了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第一，中国在亚太互联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在于中国是亚太地区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而且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亚太互联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以价值链为纽带的实体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不断进行的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一定能带动亚太经济的升级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速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使其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中国产业升级所释放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生产任务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这有利于东南亚国家更快融入亚太互联经济之中。同时，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还会为亚太互联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生产服务，助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的发展。

第二，“一带一路”将为亚太地区提供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模式，打造经济全球化的升级版。随着亚太互联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已经不局限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互联互通更能加快互联经济深入发展。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将为推动更加均衡、包容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注入持久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沿线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是“一带一路”整合区域经济、促进协调联动发展的重要手段。纵观逆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弊端，以邻为壑的政策、零和博弈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将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也终将没有市场。“一带一路”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机遇，也将开启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正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即东亚和西欧才是全球经济和战略的重心。<sup>56</sup>正是联接东西方发展的“一带一路”在实现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政策沟通五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sup>57</sup>

第三，“一带一路”下的区域价值链，不仅可以带动沿线国家富裕产能和资金“走出去”，也有利于各国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间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动力，为沿线国家创造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sup>58</sup>在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已经成熟的情形下，“一带一路”所带动的沿线区域价值链将拓展亚太价值链向西发展，成为提升新型国际分工合作的新平台。所形成新的价值链不仅能使沿线国家成为互联

<sup>56</sup>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版。

<sup>57</sup>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北京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了五大类的成果清单，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参见<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0/2017/0516/c24-422.html>。

<sup>58</sup>马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载《人民日报》2016年8月23日，第23版。



经济体，在此基础上，还能发挥区域价值链的辐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所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IGT 简介：**国际贸易研究系列（Inside Global Trade）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组织和发布的。该系列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主要成员包括余永定研究员、宋泓研究员、姚枝仲研究员、倪月菊研究员、田丰研究员、东艳研究员、李春顶副研究员、高凌云副研究员、马涛副研究员、张琳博士和苏庆义副研究员。

**声明：**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欢迎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订阅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iwep\_ite，名称：社科国贸）

